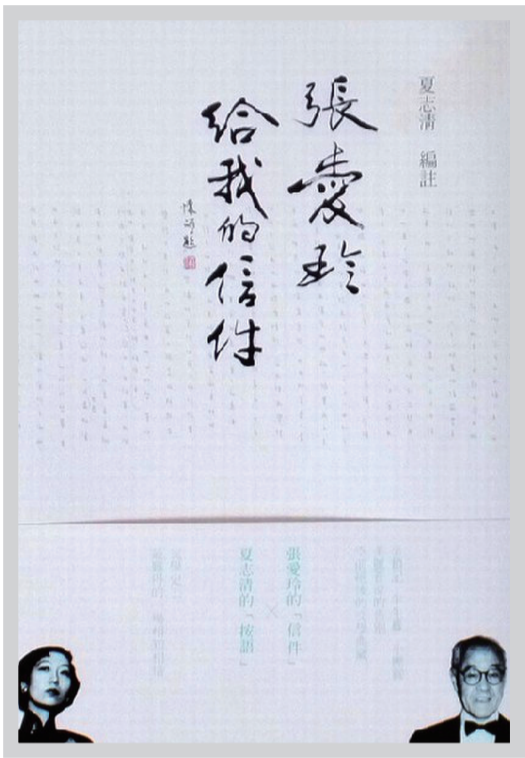


# 通往张爱玲的线索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夏志清  
联合文学出版社

在台湾,年轻作家被人说“写得像张爱玲”或“张爱玲之后最……”“张爱玲传人”“张派”等判语是一种无疑的盛赞。与此相比,“海派”二字在台湾倒是提得很稀有,他们更重视张爱玲在接受史意义上与台湾文学的关系。

台湾将这场造神运动发扬了三十年,这背后当然有其复杂的成因。但夏志清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所做的平衡与努力显然比现今的张

爱玲研究要更正常一些。张爱玲研究也只是夏志清全部中国文学论述中的一部分。

张、夏有文学因缘自不必说,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欣赏与帮助也是坦诚与本分的,只是夏志清可能并未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会将两人全部通信出版,不然也不会在如今懊恼因搬家遗落了一些信件,及这些年随着报纸、杂志及书信研究渐渐成为台湾文学研究的显学,张爱玲研究也呈现出

了越来越独特的边际。

张爱玲与庄信正、宋淇夫妇的通信陆续公之于世,2004年周芬伶发现并公布了一批张爱玲信件,包括张爱玲与赖雅韵的6封书信。2012年苏伟贞也公布了张爱玲十多封亲笔信。字里行间,深入揣摩,成为了所有想要进入张爱玲研究的读者必须要准备好的姿态。要帮助已经不在人间的张爱玲,虚构一个日常的张爱玲神秘、虚无且哀切、孤零零地生活。

无论是张爱玲的朋友、见过一面的人、模仿她的人、对她好奇的人,都在似有若无中参与了这种虚构。这种虚构与象征虽然称不上很伟大,但至少是很壮观的,前赴后继的,且还追逐着时间渗透着经济的力量。

对于书信集是否应该公开的问题,似乎也是到了张爱玲这里就显得尤为敏感。一方面透露着张迷及张爱玲研究者对于她只字片语的珍惜,另一方面也实在令人唏嘘。所有的朋友将隐私当做商品贩售,人们对于已故女作家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幻想着编纂《张爱玲书信全集》可能本身就是一个现实意义上虚妄的求全。《对照记》里说的“三搬当一烧”都烧不掉了后世掘地三尺也不遗漏一个笔迹的狂热。

在与苏伟贞的对话中,王安忆曾说:“也许我们不能想象张爱玲这样的一个人,和我的同代人,和你们是同代人,就是你们目前看到的一个人和张爱玲有接触……苏老师和张爱玲有通信,如果没有通信的话,我们觉得张爱玲是遥不可及,可是有了这个通信,我们觉得有了这个线索,是可以连接起来的。”书信存在的积极意义莫过于此。但当大家都争着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爱玲”时,其实最终得到的也无外乎是她搬家遗失东西、疾病、孤寂,文学经营上依赖

他人的无助、在英文世界的失意、及生活的窘困。她一遍一遍书写自己,也就不不断拉近着书信语境之下作家的生活细节与其作品生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关系,是一种虚构的修辞。且参与修辞的人文学素养越好,这种关系就越不可靠。

之所以提到台湾文学与《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两者其实密不可分。现时台湾文学对于张爱玲学的过分强调,催生了“遗作”、“信件”等的不断曝光。但这些曝光看似增补了张爱玲研究中细枝末节的空白,破了神秘,众望是否能达到旨归也很难说。好在张爱玲统统看不到听不到。

夏志清是现今公之于世与张爱玲通信最多的人之一。两人通信始于1963年。张爱玲寄给夏的信札,年卡和名片共计118件,按日期先后排列,照发信地址分成六组。夏志清给每封信后加上按语,对事实及背景加以注解和说明。张爱玲过世后,与她曾有来往者纷纷披露所持信件,但数量均无法与夏志清的上百封信件相比。《信件》最早刊于1997年四月号的《联合文学》杂志,陆续刊载至2002年七月号为止。从夏志清现存1963年5月9日最早的信算起,至1994年5月2日最后一封信为止,三十一年之间,虽有遗失,却也不失为一个绵延丰富的心灵时空。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阅读谈写作谈生涯,谈重写历程,翻译尝试,教书生涯。基本勾勒了三十年的生活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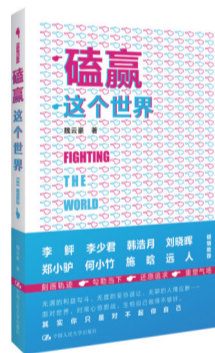
在《信件》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志清与张爱玲之间的信任建立于漫长的枯燥的文学生活中。夏志清的按语细致、清晰,有没有参考价值普通读者无法评论。但记忆本身是一种再现,再现都似梦迷离。

(来源:新华读书)



《梦想·机遇·改革》  
作者:何平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全书分为“变局与大势”“机遇与抉择”“探索与启示”“改革与圆梦”四篇十三章。论著站在时代制高点上,通过大量鲜活事例,集中回答了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战略机遇,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重大课题,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打赢这个世界》  
作者:魏云韶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青春一直都在,路也总在我们脚下,不是天才,也没有奇遇,和小人物一起来死磕吧,直至磕赢这个世界。本书围绕裸婚、啃老、房奴、孩奴、创业、压力山大……全景式呈现了80后在现实中的迷茫、思考与责任。



《我的皇室家族》  
作者:爱新觉罗·恒懿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皇室家族百年兴衰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清皇室直系后裔、著名女画家爱新觉罗·恒懿历经艰辛寻访史料,走访家族长辈,历时十三年创作本书,讲述了家族的故事,也写下了自己的艰辛奋斗史。

# 你孤独吗? 你幸福吗?



《长崎》  
(法)埃里克·法伊  
上海译文出版社

类似这样一个人孤独生活的故事,有奥地利作家格拉维尼奇极端的《一个人到世界尽头》,也有村上春树在《天黑以后》中描述的被一个摄像

机整日监控的少女形象。埃里克·法伊没有那么黑暗,他只是观察人和社会的现状,然后在文字里阐释自己的思考。

对在大城市长大的我们来说,不认识邻居,不知道隔壁家住了几口人,每天刷着社交网络却极端缺乏“社交”的状况,早已不那么新鲜。社会保障体系的僵硬,人际关系的冷漠,现代人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能解释《长崎》里的一切。但如果能注意到法伊灌注在小说里的几个关键词:焦虑、老人、机器人、遗忘、改变,我们是不是能体会到别的呢?

《长崎》的男主人公一人生活,没有妻儿,亲戚几乎不相往来,工作之外很少和同事交流,甚至平时说话最多的可能是社区退休大妈。隐隐的,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没有妻子,没有一个能让他感受到生命幸福的女人。他的焦虑流露在对月台上等车的上班族思绪的猜测,流露在对电视报道百岁老人生活的冷嘲热讽中。但反讽的是,正是电视带来的、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关于别人生活的评论,让他的焦虑开始平复。

这种心境的变化其实很熟悉,当我们在谈论别人的幸福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呢?雷蒙德·卡佛体的流行,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质询:当你要回答“你幸福吗”的时候,难道只能是在点评别人的幸福时,才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

新闻报道里的这位百岁老人几次出现在《长崎》的故事中,这肯定是法伊对现今发达国家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的关注。而有趣的是,这段老龄化桥段的后面多半跟着男主人公对机器人的一段奇谈怪论:它会看着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温柔地呼唤垂死的我的名字,打电话给殡仪馆和火葬场等等。

那么,发达的科技,高度的工业化,除了带给人方便和快捷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吗?法伊借着男人的口说:现在身边最忠诚的人,或许就是那台阴险的电冰箱——Always being with you. 阴险,但也只有阴险冰冷的它,才会真正且忠诚地陪伴着你,直到你——或者是它——走到尽头。

《长崎》的文体很独特,法伊用了两个视角去叙事。男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在被窥视和闯入的痛恨,以及对破坏无家可归者难得安逸和陶醉的痛苦之间反复转换。

此外,作者在故事结束后又加上了第三人称叙述的女人视角,还有一封将故事引向一个出人意料,但又带着些许无奈且温情的线索。埃里克·法伊笔下的女人身上,浓缩着日本人强烈的会因为失败而深深自卑以及自责的民族特性。或许他在小说最后让女人有机会从主观视角阐释自己对这座房子的深厚感情,是为了让《长崎》显得不那么冰冷,让人的孤独——或者是作者自己所说的“普遍意义上的孤独”——能不显得那么无病呻吟,那么冷酷无情。可是法伊在把女人的悲剧,从现实的人际冷漠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又把我们引入到另一种更加无法解脱的情感中:这座房子是女人人生中的一段重要印记,可这印记随随便便就被人夺走、打碎。

直到一年前,当女人仿佛依赖动物回溯本能一般重新触摸到了这段重要的人生印记时,又有人再一次把她的生命夺走、打碎。

(来源:新华读书)